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晓晴

(黑龙江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著名的批判理论学派,他们在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行制度展开深入批判时,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哲学的和谐思想。他们意识到人类已经深深陷入了异化状态中,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已经被破坏,因此,他们积极努力于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及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和谐;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弗洛姆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07)04-0066-0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庞杂的理论系统著称。尤其是面对西方人所面临的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以及人的异化受动地存在方式,他们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发展和继承了马克思的和谐思想,致力于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积极致力于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及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一、马克思哲学中的和谐思想

和谐是指事物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社会和谐是指社会共同体内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国古代思想家、西方学者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开始关注,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学者们大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和谐思维,它是一种系统思维、美的思维、实践性思维,运用和谐思维,形成和谐意识,对当代社会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可以使我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

我等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在现实上,不仅能够破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片面看法,而且能够为解决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以及频繁发生的各类社会冲突和混乱等难题提供思想指导。

马克思的社会和谐思想萌生于其对异化的深刻认识。他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等人的异化思想,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本质、起源和意义的考察,系统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他指出,劳动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者被劳动产品所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异化,这在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一种深层诠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他的社会和谐思想,虽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的确已经开始萌发。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118};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①117}也就是说,实践是异化与社会和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扬弃异化、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因为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革命的实践”,即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交往实践和科学实践等,不断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摆脱人与自我的分裂,改善并密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各种矛盾、斗争和冲突

收稿日期 2007-03-0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06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内的和谐问题》(11512049)和 2006 年黑龙江省社科规划办项目《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对构建和谐龙江的影响》阶段性成果(06D035)

作者简介 李晓晴(197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兼职人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不断得到化解,人也慢慢由受抑制到自由,由狭隘地域性到具有世界历史性和真正普遍性,进而达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但是,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个片面的畸形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人的畸形发展和异化等弊端,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只有铲除这种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和谐现象,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实现和谐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达到真正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和谐社会表现为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化生产,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消灭,社会关系和谐,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消失,人、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等等。简而言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其矛盾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马克思哲学中的社会和谐思想无疑给后来的人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启迪,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这个基础和框架出发,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本质上的异化,进而寻求达到和谐社会彼岸的有效途径。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的和谐思想集中体现在劳动异化理论之中,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和谐思想时,也正是从劳动异化理论出发,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及社会等几个方面入手,创造性勾勒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实现社会和谐的革命战略。

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兰克福派对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批判,进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是其理论特点之一,其中以马尔库塞最有代表性。他在探讨革命和解放的主题的同时,提出了激进的“自然的解放”的主张,即人对自然关系上的变革。

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与存在相适应的统一;人不是在自然界中,自然界不是人只有离开自己的内部状态才能达到的外部世界,人就是自然界;凡是在人的历史上遇到的自然界,都是“人的自然界”,而人也永远是“人的自然界”。所以,人的解放取决于自然的解放。当代工业社会在压抑人的同时也在压抑自然,与人的异化同步

的是自然的异化。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声、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生态危机作为生态系统的失衡状态,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对立引起的,而这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论自然观带来的,甚至可以说,生态危机是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是工业文明或科技文明的危机,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马尔库塞主张,要把自然变得与人性相符合,成为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自然不再是材料、无机物,而是主体—客体,是独立的生命力;解放自然就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解放自然意味着使自然获得自由,上升到自然美的诗意境界,使自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论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认为马克思在维持唯心论的批判的先验的因素的同时,达到了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的统一、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并使这一统一的物质的历史的基础进入到人的意识之中。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论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对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现象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并深刻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与其他西方学者相比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容和广阔的视野。尤其是他创造性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然观。

人与人的和谐。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从马克思的社会交往学说开始,主张重建交往理性,并以此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公正。

在哈贝马斯那里,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称为工具性行为;二是社会集团成员根据共同价值和规范调节的行为,称为规范调节的行为;三是行为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称为戏剧式行为;四是一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称为交往行为^[2]。相比于其他三种行为,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符合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有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理论理性表达真理性,实践理性表达真诚性,审美理性表达正确性。在交往行为中,这三个同样原初的有效性要求体现了一致

关联 哈贝马斯将其称之为合理性。

怎样去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呢,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这个途径让所有处于同一环境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自己面对问题的言谈之中,从而通过商谈、对话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通过对话形成共识是问题的关键,对话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因为对话双方选择了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因此,交往行为实际上是语言行为,交往行为理论必须对语言的语用层次进行分析和重建。他一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语言哲学的一味批判态度,而致力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哲学范式转向”,建立“普遍语用学”,提出人们在交往中,不仅具有语言能力,还应具有建立相互主体交往关系的能力。他的语用学启发人们必须注意实际交谈行为的规范性问题。由此,他设计“理想的言谈环境”的场景,把人们引向一种对社会现象与传统或意识形态保持警惕的批判意识,从而与那种顺从奴化心理相区别,为直接参与及推动社会发展奠定一种坚实的实践理性基础。“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不同,交往性行为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先设定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3]哈贝马斯认为,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因为必要数量的、共同的社会规范是社会关系能够不受干扰与破坏而得以正常维持并发挥社会同一性作用的基本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交往行为理论最终企及的就是使交往行为受共同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指导,促使交往行为的实践合理化,使社会呈现出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前景。被认可、重视的社会规范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遵循。人们普遍接受并乐意遵循的共同的社会规范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条是“经验的路线”,它通过刺激和威吓动员实现道德律令的普遍化;一条是“理性的路线”,它通过论证的意见一致所动员的信任使得道德律令普遍化。显然,只有后者才能使人们通过相互理解、平等对话形成一种公正的、合理的意志,并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交往参与者作为有责任能力的行为者,对自己的交往行为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论证一种对自己的交往行为有着指导意义的“先验性”前提,遵行这一规范,使得自己的交往行为合理化,从而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这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把哲学史上的交往问题研究具体化了。马克思研究了作为一般社会关系的交往对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作用和意义,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许多细节尚未提出,没有深入展开。哈贝马斯在探求人际关系和谐时,将视角具体化,始终强调以理解为核心的交往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并提出一些相应的规范和方

法,对于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意义。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仅是精神领域的活动,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类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研究,但是他通过建立“普遍语用学”,来实现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哲学范式转向”无疑是个有益的尝试,同时,他在寻找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有效途径方面的努力也功不可没。

人与自我及社会的和谐。关于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弗洛姆那里有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充分汲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营养,认为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也注意到了劳动的异化,而且还关心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身、同别人的异化。并且从马克思的“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和独立的人”这一健康人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病态社会作了全面的批判,并提出了构建理想和谐的健全社会的初步构想。

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弗洛姆把对人类状况的研究看成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关键,分析了人类生存的需要:一是相关性和自恋性。人必须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孤独的人是精神不健全的人。同时,在人际交往中又不能失去自我,丧失自尊。二是创造性。由于天赋的理性和想象,人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生物角色,而是一个创造者。一种强烈的愿望会驱使着他不断地超越生物角色以及存在的偶然性、被动性,成为一个创造者。三是要有安全感、归属感。人猿相揖别后,人开始独立于自然界,开始渐渐割裂他与自然的联系。然而,正是这种断绝使人感到身似浮萍、孤立无援。只有当人们找到新的根时,有了家园感时,他才能感到安全自在。四是身份感。人要有自我概念,需要说出并感觉到“我就是我”。身份感是人格发展过程逐渐形成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身份感”,人们就无法保持精神健全。人是理性的动物,他用理性的方式去把握理解世界。当人们的理性能力受到局限或损伤时,会陷入困惑之中,这样令人惶恐不安,缺乏自信心。因此,只有充分满足人的这四种需要,人才能得到真正发展,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需要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导致精神病症,成为“不健康的人”。

弗洛姆将未来能够实现人与自我和谐的和谐社会称为“健全社会”。他认为,建立健全社会的途径主要有三种: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十分明显,极权主义的方法只会导致不健全和非人性化的程度愈来愈严重。超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只会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的病理,使人的异化程度、无意识的机械化状况加深,从而完成了使人成为生产偶像的奴仆的全过程。唯一带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便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重整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之按照这样的方向来调整:将人从被用作自身目的之外的工具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类的团结、理性、创造性得到巩固而不是削弱。”^[4]^[23]他认为,只有在工业和

政治上、精神和哲学、性格结构和文化方面同时发动变革时,才能达到健全的社会。他对健全社会做了这样的描述:“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做是不合群的自私自利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也成了个人的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再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友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开创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需要。”^[4]^[233]

可以看出,弗洛姆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从批判异化现象入手来探寻和谐之路,把异化当做分析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中心概念,但是他不满足于把异化当做哲学、经济学、社会和法学范畴来使用。他认为,异化主要是心理问题,是一种心理体验,是人自我是否和谐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他在高扬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作了心理化、伦理化的理解,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发展,从理性、人的意识活动来考察人与自我的和谐。他没有把视野停留在单纯的人的自身剖析上,而是把心理现象放到广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对人性格的影响,分析异化的根源,把心理疾病的医治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革紧密联系起来,试图通过道德的自我修养和道德教育来实现人与自我及社会的和谐,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哲学研究的方法。

三、法兰克福学派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主题落在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上。以和谐思维弘扬和再造和谐精神,重新审视和处理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必须解决的课题,也是人类面对的共同课题。

法兰克福学派从异化理论出发,从哲学世界观、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等方面对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批判,借鉴了当时西方哲学中许多优秀的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从更广的视角和更深的层面对马克思的和谐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指出,西方现代化发展不仅造成了人和社会、人和人关系的不和谐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和谐,同时也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合乎人性的天堂,而仍然是一个压抑人性的非人道社会。他们对马克思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与人的不和谐状态、文化的不和谐状态以及人和自然的不和谐状态的批判,以及从社会制度、哲学世界观、文化伦理价值观等方面对这些不和谐状态产生的根源进行的分析和梳理,同样体现在他们试图通过社会结构和人的微观心理的双重变革,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积极探索中。虽然他们的理论带有抽象的伦理说教和乌托邦的缺陷,但从其探索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看,他们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和谐思想深入到更深层面的文化价值批判和伦理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实践精神,改变以前把发展视为单纯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以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特征的“全面发展”,以“五个统筹”为基本内容的协调发展以及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本要求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深化体制改革,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建立和健全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努力防止两极分化。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三是完善价值理论体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正确处理价值理性和科学技术理性的关系。尤其要正确处理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加快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正确的科技观、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幸福观和自然观。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20-121.
- [3]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21.
- [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刘晓英]